

中國青年行動者 年度報告(2020年)



Young Activists Alliance, 2021年2月編寫

目 錄

報告簡介	1
第一部分 疫情期間的青年行動者與自組織	4
一、行動者群體面貌	4
二、行動與組織模式	6
三、疫情中青年行動者的行動貢獻	7
四、行動者的困境和出路	8
第二部分 青年勞工行動者	10
一、行動者群體面貌	10
二、行動與組織模式	11
三、政治管控與壓制	12
四、行動者的困境和出路	13
第三部分 青年女權行動者	15
一、行動者群體面貌	15
二、行動與組織模式	15
三、政治管控與壓制	15
四、行動者的困境和出路	15
第四部分 青年身心受障行動者	16
一、行動者群體面貌	16
二、行動與組織模式	16
三、政治管控與壓制	19
四、行動者的困境和出路	19
第五部分 青年同志行動者	21
一、行動者群體面貌	21
二、行動與組織模式	21
三、政治管控與壓制	24
四、行動者的困境和出路	25

報告簡介

2020年對於中國的青年行動者來說，可以視為一個重要的轉折期。在公民行動空間持續縮小的情況下，新冠疫情帶來的社會危機，激發了青年行動者自救與救助其他群體的行動。疫情初期混亂狀態下管制相對寬鬆的環境，使青年行動者得到了一定的組織和行動空間。在不同領域的行動者融合線上和線下的組織，向不同社會群體提供信息服務、醫療救助、物資援助、心理諮詢以及陪伴等支持。雖然官方很快就收緊了民間自主行動的空間，並且對一些行動者進行了騷擾以及治罪，但在短短的幾個月時間內，青年行動者獲得了寶貴的實踐經驗。這是否會幫助青年行動者更好地成長？他們會如何繼續探索新的行動模式和理念？又如何在持續高壓的環境下發展？

本報告基於對長期趨勢的分析，針對青年行動者在2020年行動的特點進行探討。報告按照群體的不同分為四個部分：1) 青年女權行動者，2) 青年勞工行動者，3) 青年身心受障行動者，4) 青年同志行動者。¹ 這四個群體的行動者，除了有一定代表性外，也屬於相對較活躍的青年行動者。每個部分均由經驗豐富的行動者撰寫，會圍繞行動者群體的構成、行動和組織模式、政治管控與壓制、對運動困境的反思與未來出路等問題進行討論。此外，我們特別收錄了一篇疫情下青年行動者的概括性分析。基於報告中的描述與分析，我們從中可以看到如下一些特徵：

行動者群體的構成

青年行動者家庭背景多元，既有來自城市的中產家庭，亦有來自農村的普通家庭。但共同點是大多接受過高等教育，通常在大學期間對社會議題產生了興趣，並且開始參與。我們注意到在疫情期間，湧現出一批年輕的行動者，其中不僅有在校大學生，甚至出現了高中生組織和參與的群組。雖然行動者仍主要處於北京和廣州等一線城市，但打壓使一些領域的行動者分散在二三線城市，以避免騷擾並且尋找空間。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地域的政治文化和運動條件，相應會帶來一些理念和方式的不同。對於勞工行動者來說，南方行動者往往通過與勞工NGO等團體的聯繫，很早便直接介入勞工議題；而北方行動者，較多數是成長在以理論學習為主的校園社團中，相對來說直接參與經驗少一些。但不管在哪個領域和地方，行動者普遍指出自我感到的邊緣性：一方面邊緣身份來自於性少數認同或者家庭背景，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關注的議題和行動者社會地位持續被邊緣化。稍有不同的是受障者，雖然仍遭受日常中的種種歧視，但同時他們在主流社會觀念中被視為奮發向上的楷模，因此會受到更多的認可。

行動和組織模式

近年來官方的打壓導致公民社會組織被迫轉型或者解散，但這也使青年行動者不得不依靠網絡進行資訊傳播和組織工作。疫情下，這反而使得青年行動者更加熟悉線上行動的方式，並且很快便開展了線上社群連結和動員。對於青年女權行動者來說，隨著主流輿論對於性別議題的興趣上升，ta們會利用事件或話題的熱度，對事件當中的責任方問責，進而引入更多人參與到運動中。這樣

¹由於人力和資源有限，本報告暫時無法涉及所有領域的青年行動者。對於這一局限性，我們希望此後的年度報告可以予以補充。

的方式，使行動者很快將抗疫期間出現的性別權利問題納入社會討論中。青年勞工行動者同樣很快自發形成了線上團體，發起“延遲返工控制疫情”行動，向官方提出“延長休假推遲復工”的訴求，以此減緩病毒在工人中的擴散。高中生、大學生以及白領，組成了志願團隊關注環衛工防護健康。亦有青年行動者團體關注受疫情影響的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青年同志行動者對疫情之下社群面臨的問題（例如藥物缺乏和家庭矛盾）也進行了緊急動員和回應。此外，身心受障行動者也在過去的一年，重點推進資訊平權和高等教育平權。我們看到長期的趨勢，是不同領域行動者的議題有了越來越多的重合和合作。例如，青年同志行動者與青年女權行動者長期以來在個人和網絡上的重合，許多校園同志小組同時也是校園內女權議題的推動者，以及身心受障行動者開始探索與性別和老年人的議題交叉。

政治管控與壓制

青年運動者普遍面臨著多層政治和經濟上的壓力，處境未有明顯的好轉。2018年佳士事件後的持續高壓，對青年行動者所在的組織與網絡造成了重大的破壞，同時對大學學生社團和實踐的控制，也使培養未來青年行動者變得更加困難。而剛剛獲得一些個人自由的行動者，其生活和工作仍處於密切監控之中，因而難以重新投入運動中。去年延續了過去兩年的趨勢，尤其是言論自由更加緊縮，工作變得更加艱難，持續受到官方輿論的汙名化，運動者彼此連結受到影響，個人日常生活和經濟狀況也出現危機。有些領域，此前官方對於活動的支持或默許也被收回，例如已經連續舉辦十二年的“上海驕傲節”在2020年被迫終止所有活動。相比起其他領域，身心受障還未被化為敏感議題，官方比較容忍此議題的討論，行動者便利用這個空間用溫和的方式在線上進行權利意識普及、經驗分享、網絡聲援。但整體來說，機構和個人行動者在過去一年都在夾縫中生存，並且做各種新的嘗試。例如青年勞工行動者，開始更多關注服務業以及白領群體，倡導和實踐白領群體間的合作社建設，組織關於“社畜”、“打工人”等議題的文化討論。

對運動困境的反思與未來出路

社會運動持續處在困境中，迫使青年行動者去尋找對運動新的想像。青年勞工行動者在反思勞工機構多年來一直專注於臨時勞資危機介入，而對於工人在工作場所的日常權力壓迫缺乏行動干預，這導致了工人群體長期賦能培育的薄弱，因而應該更加加強對工人群體更直接的實踐性認知和日常組織實踐。青年女權行動者認為，不管打壓多麼嚴重，因為女權議題的關注度在持續提高，關注人群在擴大，也就意味著針對性地加入行動或者觀點的空間也一定存在。對於青年同志行動者與青年身心受障行動者來說，如何將各自社群的議題更好融入到主流輿論中則尤為重要。例如，將“性教育”和“防治校園欺凌”正式納入未成年人保護法。最後，行動者均提出需要不間斷的自我成長，保持彼此和外界的連結，不停的反思與絕不吝惜的分享，學習其他社會運動的經驗，開展交叉領域的合作，並且建立廣泛聯盟，將會是這個階段最重要的目標。

建議

基於青年行動者的經驗和分析，我們能看出疫情下湧現出了一批新的行動者，雖然還不成熟但在慢慢成長，同時此前有經驗的行動者，雖然持續被打壓和控制，但在急需的時刻還是會行動和帶

動年輕的行動者。雖然目前成立機構和以機構形式去行動的障礙很大，但外部支持者還是可以設法支持不同的網絡和青年行動者的個人成長。對此，我們願意提出兩方面的建議以供參考。

首先，在行動者孤立感和無力感越來越強的狀況下，我們需要盡可能創造不同的機會和平台，將來自不同地域、不同議題領域和不同代際的行動者聚集在一起進行交流。交流的內涵可以是多方面的，例如熱點社會議題、行動者的個人生命故事、如何在威權體制下尋找行動空間等等。交流後ta們必定會建立不同形式的日常小組，而這些小組將會起到傳遞行動經驗、提供陪伴支援、深耕議題與社區、建立廣泛聯盟以及推進社會改革的作用。

其次，在權利型機構越來越少的情況下，需要為那些分散在各地、還沒有機構承接的年輕一代行動者提供系統而全面的能力建設培訓，幫助ta們提升公民意識和行動技能，並且提供相應的資源支持。幾個比較重要而且符合ta們需求的主題可以是這些：風險預防和應對技巧、心理減壓和運動創傷療愈技巧、如何將抗爭日常化、如何運營日常小組等等。

第一部分 疫情期間的青年行動者與自組織

撰寫者：羚恩

2020 年初，新冠肺炎在武漢爆發，青年行動者開始介入疫情救援。其中，有行動者原本就長年深耕於公益領域，或長期關注公共議題；也有青年人在救援中成長為行動者，獲得了首次社會行動參與經驗。

除了個人行動者的個體行動之外，自組織成為這一次疫情救援中最常見的組織形式。遠端協作工具為這一次行動者自組織提供了新的助力，使得雖不能親臨現場但依然可以有效參與成為了可能，也為全球青年的聯合行動，線上線下的行動整合提供了基礎。

疫情期間，一度出現類似 2008 年汶川地震時期自組織蓬勃發展的景象，政府對行動者的行動約束、行動管制、信息傳遞也相對放鬆。行動者與服務對象形成互幫互助關係，疫情面前能夠拋開或忽略其餘理念可能的相斥，無衝突地進行單一議題下的單純合作。

隨著物資緊缺得到紓解，政府支持終於落實，對行動者與自組織的約束與壓制也隨之到來。行動者被約談、被警告慣性發生，更有行動者因疫情期間備份公開信息被批捕。行動組織審時度勢，除與機構合作的組織仍有部分得以發展成為項目存續進行之外，絕大部分組織都隨著新一輪的言論管控，最終沉默收尾。

至今，都有極少數行動者與組織以自發組織的形式，經由線上或線下的分享會、培訓會等，對行動進行復盤反思和經驗交流與分享。也有行動者以個人為單位，持續進行對行動的觀察、記錄與研究。

一、行動者群體面貌

疫情期間的青年行動者是應社會公共衛生危機誕生的，新興的、臨時的行動共同體。

首先，簡單描述行動者群像：

1. 年輕化參與趨勢。在多個行動者團隊中，大學生都是主力參與群體。年輕的行動者更是展現了組織能力與發起能力。例如：某捐助醫療物資組織的贊助者為高中生團體。
2. 具備專業化背景。今次參與的行動者中，部分行動者具備公共衛生、醫學、心理諮詢、社會工作、應急救災等專業知識與技能，並曾有一線救援、救助經驗。
3. 有經驗行動者的帶領與倡導。在這一次疫情救援中，長期深耕於公益行業或一線草根機構的行動者發揮了引領作用，初期以具備應急救援能力與公益資源調動經驗的行動者率先搭建組織，積極介入，呼召參與，協調帶領。

這部分有先前經驗的行動者，為自組織奠定了普遍適用的行動原則，例如：救助對象信息保密原則等； 啟發了自組織的自我保護意識，例如：行動需要有邊界，審慎選擇介入方式等； 帶入了性別平等意識，例如：方艙建立後及時宣傳與倡導反性騷擾知識等； 提醒了行動者的自我關照，例如：關照行動者自身的生理健康與心理狀態，並及時聯絡資源提供支持。

4. 廣泛參與，開展特色行動。跟隨協調與呼籲，來自各行各業、各個領域的青年行動者陸續加入，並基於參與者的不同背景、身份等形成了特色組織。例如：來自互聯網行業的行動者自發成立的某自組織，其組織行動方向即為利用產品、程序設計技術，搭建並製作物資信息平台； 動物保護行動者則成立了幫助小動物尋找和傳遞生存物資的團體； 孕婦行動者成立了孕婦關注與支持團隊； 工人權益行動者則特別關注環衛工人的防護需求等。
5. 具備性別意識。部分行動者具備良好的性別平權意識。他們率先關注到一線女性醫務工作者的生理，倡導社會給予安心褲等捐贈支持。方艙建立初期，就有長期關注性別議題的行動者發起反性暴力倡議，普及反性騷擾知識，在方艙群體中，基本達成了事前介入。在疫情過程中，有醫院強迫女性醫務工作者剃髮宣誓，針對這類侮辱性行為，行動者們也及時做出了聲援和抗議。
6. 有全球聯動能力。線上技術與遠端協作工具讓跨地域的連結與協作成為可能。這一次疫情救援中，海外青年行動者與國內青年行動者形成了自發的互動、連結關係。在部分項目中，跨時區合作也讓組織與項目得以在最緊張的時候 24 小時周轉。在國內疫情穩定後，部分行動者又將行動目的地轉向海外，參與新一輪信息傳譯、物資運輸、經驗分享等支持行動。

其次，粗淺地探查行動者的參與動機。綜合某組織的行動者報名表單中參與動機一欄，和某研究人員後續訪談成果，瞭解到本次青年行動者的參與有如下動機：

1. 源於地域情結。地域情結又可以區分為在地連結與遠端連結。在地行動者更多是源於物理空間限制，使得他們在體驗災難中無可迴避需要做出“是否行動”的選擇；遠程行動者中不少人可能曾有在疫區讀書、生活的經歷，或疫情發生當時有親朋好友深陷疫區。他們參與行動更多是源於一種記憶與情感連結，促使他們即便遠隔萬水千山，也要想方設法在線上再造行動空間。這一類的青年行動者自組織在本次疫情中集中表現為校友組織。
2. 自救動機。也就是行動者參與行動更多不是源於無私奉獻，而是災難環境給他們帶來巨大的生存挑戰，危機感促使他們自我援助，在過程中逐步拓展為對他者的說明。這一點在湖北籍的行動者中體現最為明顯。
3. 倖存者的內疚感。認為自己是疫情的倖存者，沒有承擔災難後果，因此渴望與他者同甘共苦。
4. 作為公民的自覺意識。這部分行動者人數比例較少，在行動過程中，實際比較能夠擔當“社工”方向的行動角色。

5. 逃離失序生活的無助感，希望通過行動找回對生活的控制力。對於這一類行動者來說，參與行動的動機是自我焦慮的轉移。根據某行動者自組織協調人的觀察，這一類行動者往往在行動中缺乏行動能量，行動參與比較不穩定，產出成果也相對較弱。

此外，本次疫情的青年行動者，除了少部分具備公民意識的行動者之外，絕大多數參與者，儘管實際行為是在參與公共救援與社會行動，但在自我身分認同上並未將自己定義為“行動者”，更多習慣性描述自己為“志願者”。對社會行動以及與社會行動相關的“公民意識”、“公民參與”、“公民身份”、“公民權益”等概念都表現出陌生感。對參與疫情救援更多理解為一次“志願服務”，在救援過程中更多實踐的是個人價值，較少意識到自己是正在實踐公民價值；在助人過程中更多幫助的是他人所需，較少意識到幫助落實的是他人的權益權利，參與者對個人行為的定義是去政治化的。

二、行動與組織模式

此次疫情過程中，除了個人化行動，青年行動者的自組織呈現出三種主要組織型態。包含：

1. 中心化。例如校友會組織、僑會組織、商會組織等。其本身已有中心化組織架構作為基礎，基於已有的人員與資源網絡進行拓展，“有多少力辦多大事”。行動具有一定的框架性，組織較為有秩序。在此次疫情救援中，也有原本完全脫離中心化組織自發成立的自組織行動者出於安全考慮，將原本的自組織團隊掛靠或乾脆合併在中心化組織下進行運營，以防被質疑組織與行動的合法性，在行動過程中，這部分行動者仍然具備極高的自主意識和能動性。
2. 去中心化。例如某 2020 項目組織，則為典型的去中心化組織。其表現形式為參與者共創，沒有明確的管理機制與清晰的組織結構，鼓勵行動者的自我貢獻，要求行動者能夠進行快速和精準的自我定位與能力匹配。在項目開展過程中，以共創與共同決議為推進方式。項目充分運用互聯網協作工具，完全開源，資訊透明，吸引了大量人員參與，特別是推行去中心化的技術人員，組織具備較大的影響力。不過，這類項目同時也缺少明確的定位、策略，參與人員較為鬆散，難以培育出組織存續所必要的成員連帶與信任關係，因此行動產出有限。
3. 任務分派式。例如某項目組織，由若干行動者發起，並進行行動者招募。組織初期就設定了較為清晰的組織定位，規定了組織服務範疇，設置了初始功能模塊。在行動過程中，由發起人擔任協調人，與協作型行動者一起共同決議，進行目標設定與任務分派。行動雖有統一的願景與行動認同，但各功能模塊相對獨立發展，分別進行行動探索，並不斷衍生出新的功能模塊；行動中後期，也有功能模塊與初始組織分離，成為更加獨立運作的小組、團隊，誕生新的目標、願景與策略。行動者之間的協作特徵明顯，以“協調-任務分派與成果回收-再協調”為行動方式與組織特色。

這一類組織的運轉也有不少難點需要克服。例如：各個行動節點的溝通與合作往往比較困難，在行動密集時難以建立高效、密集的信息溝通管道；各個行動節點方向的自我修正與

調整，可能會給行動者帶來行動意義前後不連貫的困惑；同時，各行動節點的自運營可能會導致不同節點的行動內容重複；以及行動節點各自產出，難以整合影響力進行對外輸出。

綜上，無論哪一種組織形式，只要社會關係較為陌生的行動者聚合，在應急狀態下的協調、溝通與合作都困難重重。相信這一次疫情，對不少行動者的領導力、策略能力、管理與運營能力、協作與溝通能力都發出了不小的挑戰。部分行動者已經意識到日常建立親和小組，嘗試行動組織準備演練的必要性。

三、疫情中青年行動者的行動貢獻

在這一次疫情中，行動者的身影出現在各個環節：

1. 信息服務：

- a) 行動者在初期資訊不流通時，整理、傳遞疫情信息，實踐公民知情權。
- b) 主動問詢、收集與整理醫學建議與防疫知識，將其製作為各種形式的信息包，例如某組織編寫的《居家隔離指南》。
- c) 日夜不間斷溝通醫院、醫務工作者整理病區信息。如某床位小組以日為單位整理和發佈床位信息，為待就診患者提供就醫指引。
- d) 求助信息收集、核實、錄入。行動者團隊都接到國家與地方媒體的記者或工作人員聯絡，請求行動者配合收集與上報求助信息，幫助政府推進收治工作。

2. 醫療救助：

- a) 為居家隔離患者提供免費的線上醫療諮詢與指引。
- b) 為居家隔離患者輸送醫療器材、設備。例如：家用制氧機、呼吸機等，行動者通過無接觸方式送至居家隔離的患者家中。因造價較高，這一類行動往往需要聯合一定實力的機構或個人的支持。

3. 物資援助：

- a) 行動範圍包括但不限於行動者協調或自發進行的物資全球採購、合規鑒定、境內外運輸、在地運輸等。
- b) 物資援助最困難的環節為突破各種行政限制或運輸客觀條件限制。某組織的救援物資運輸，因為關卡限制，就經歷了旅遊領隊人肉背貨，民用直升機跨省運輸，當地市民車隊接力，經歷高架關卡拋貨接貨等組合運輸方式，最終得以送往目的醫院。
- c) 物資援助所需時常超過了大部分行動者的預期。某組織協調人原本沒有想要參與物資援助，但前線告急，醫務工作者工作環境極度惡劣，就不得不做。

4. 心理諮詢、支持與陪伴：

- a) 此項行動者均具備心理學專業及社會工作專業與實際操作能力。行動者內設有督導團隊，帶領並支持一線行動者。
- b) 主要行動內容包括：
 - 線上大群內患者、家屬及其親友的心理支持、陪伴。
 - 一對一免費心理諮詢與長期跟進。
 - 線上課程製作，線上知識分享，線上工作坊與活動（例如正念、代禱、心靈清潔等）的籌備、策劃與落地。
 - 方艙患者的空中心理支持。與某社工專業教授合作的行動者團隊，線上接入了武漢城市客廳方艙與武昌方艙，使這兩個方艙成為最早，也是唯一有線上心理援助的方艙。根據某長期跟進行動者講述，輔導效果顯示出有空中心理支持的方艙新冠患者較無心理支持的患者恢復較好。
 - 疫情引致生命逝去，要求行動者特別參與到哀傷輔導與喪親關懷的領域中。某行動小組就專門整理了輔導手冊，手冊還特別考慮到不同宗教與風俗習慣。
 - 災後心理重建的持續與延伸。
- c) 經驗與觀察
 - 心理行動者在行動過程中，總結並觀察到了普通民眾對心理援助資源的陌生、抵觸、抗拒心態，這種心態主要源於日常的資源緊缺與心理資源求助、運用意識的薄弱，以及專業領域從業者的緊缺。
 - 某行動者告訴撰寫者，社工背景的行動者是心理背景行動者強有力的合作夥伴。心理背景的行動者往往會有“不求不助”的固定處理思維，但社工行動者的加入，使得行動團隊的行動力加乘，與社區等第三方的溝通變得更順暢、高效。

四、行動者的困境和出路

1. 行動者普遍缺乏公民意識以及公共事務的參與能力。不少人的參與，其實是出於人人自危自救的恐懼心態，為生存需求所驅動，而非公民意識或公共參與動機所驅動。絕大多數的行動者日常完全沒有機會和渠道瞭解或學習應急救災，且顯然缺乏相應的專業培訓。
2. 自組織幾乎都為應急狀態下臨時搭建，發起者或協調者中少有真正具備行動帶領能力的行動者。組織運轉缺少先驗經驗可以直接應用，組織運轉多憑靠本能、經驗與快速學習。組織手段、策略、方法都相對原始和粗糙。
3. 社會環境與政府政策並不利於自組織的存續。這一次雖然可謂出於自救本能，拋卻觀念、政見、成見進行民間大協作，但其實各群體並未有時間、機會彼此瞭解，更沒有探索長期合作與持續互動的可能。長期對民間自組織行動的打壓，導致民間根本喪失了自組織成長與發展的土壤，因此，這一次轟轟烈烈的民間自組織大救援過後，並未生長出為人所知的新興的社會團體。已經可以看到的是，自組織的應急經驗，很難尋找到合適的渠道傳遞給後續的行動者。下一次此類型公共危機事件來臨時，我們面臨的境況、採取的行動模式可能是近似的，缺少疊代的。

4. 信息公開與言論自由。某志願者告訴筆者，在疫情行動中做社區工作時（幫助銷售滯銷農產品，對接社區購買），因為信息不公開，導致很難瞭解當地政策、限制和要求，大大削弱了行動的有效性。同時，如前文中所述，在疫情中後期，政府通過媒體主動聯絡行動者索取求助信息，就直接體現了政府對民間自組織參與不可迴避的實際需要，也更說明了自組織對政府履行職能的切實幫助。
5. 行動者在逆流中不間斷的自我成長。不能結成網絡的時刻，我們各自努力。通過疫情的行動與參與，行動者可以進一步成長成為全球行動及行動經驗積極的觀察者和學習者。利用一切資源，培育自己的公民意識和行動能力；嘗試建立親和小組，研習行動策略，為下一次參與或領導行動做準備。這一次疫情，也讓不少朝九晚五的“打工人”看到了兼職行動的可能，感受到行動中個人價值與社會需求的契合，也為之後再次被喚醒參與行動埋下火種。我們可以鼓勵這類出於萌芽期的行動者多多發掘更貼近生活的日常行動機會，從社區參與做起，延續行動習慣，嘗試多一些事前介入，為提前籌備行動創造更多條件。
6. 自組織存續的多種可能。某自組織研究者與培育者建議，中國行動者可以更多研究並探索自組織型態的可能性。例如：傘狀組織結構，國際特赦組織即採取此組織型態。同時，可以更多關注並研究海外應急組織的演變路徑，瞭解其如何存續發展，並得以為長期組織。
7. 永不停息的反思，與絕不吝惜的分享。行動經驗只有通過不斷的復盤才有反覆運算的可能，反覆運算的產生才能帶來行動策略的升級和行動效果的提升。中國的行動者，要想方設法保留行動心得，並多創造機會進行經驗分享，努力突圍代際傳遞的斷裂。非典到新冠，民間行動的圖景並沒有根本性的改變，下一次呢，我們是否依然只能應激、被迫行動？

第二部分 青年勞工行動者

撰寫者：匿名

2020 年是異常艱難的一年。新冠疫情在中國境內的蔓延，造成大範圍的產業停滯和失業潮，既加劇了底層勞動者的生存壓力，也加速了勞動者保障體系的瓦解和勞動關係的非正規化進程。當然，疫情下的社會危機，一定程度上也短暫提供給青年勞工行動者介入工人議題的可能性。遺憾的是，國家利用疫情持續收緊社會控制，限縮勞工 NGO 等民間自組織的行動空間和社會介入。過去數年的政治管控在不斷加強。本報告將嘗試梳理 2020 年青年行動者在勞工議題上的行動實踐以及群體所面對的政治管控，並嘗試對既有的行動模式進行反思，探討新的實踐思路。

一、行動者群體面貌

參與勞工議題的青年行動者，從家庭背景上非常多元。勞工議題雖側重於底層壓迫和社會不平等，但關注的青年群體既有來自城市中產家庭，亦有來自農村的普通家庭，此部分在既往的年度報告中已有詳細撰述。這類群體多數接受過或正在接受高等教育，基於對自身所在階級群體處境的反思、或受到理論教育形成對資本主義下社會貧富差距的批評等，開始關注當下中國工人群體的命運與反抗。此外，行動者早期身份的邊緣性，如作為性少數認同、或農村身份、或被主流排斥等的其他邊緣性認同，同樣是其成為勞工議題行動者的重要觸發點。

在成長路徑上，行動者在南北地域上有著非常不同的行動脈絡。在過去較長時間，以廣州為代表的南方行動者是通過與勞工 NGO 等民間團體互動而開始介入勞工議題，具體參與方式包括成為志願者、實習生或相關的實踐能力培訓等。行動者在具體的勞工實踐中不斷建立自身對於工人境況、社會不平等和資本剝削的認知，進而激發對於勞工實踐的認同。行動者參與勞工實踐的方式，也是沿襲傳統上的勞工 NGO 模式，紮根到具體工人社群做相應的支持性服務，包括提供社區服務、技能培訓、法律諮詢，以及必要的案例介入支持。

以北京為核心的北方行動者則多數是成長於校園社團，通過讀書會、觀影會、工地外展或校內實踐（如開設工人課堂、工人調研等）等社團活動開啟自身的勞工啟蒙。其中對於工人運動的支持和認同，主要來源於理論學習。相應的，青年行動者實踐的範式多以調研或者進廠為主，少數亦會加入到勞工 NGO。

南方和北方青年行動者之間的互動並不算多，亦未建立充分的理解。南方行動者偏重於直接介入一線工人困境，而乏於理論上的反思和意識形態批評，行動者間相對分散和多元；北方行動者以理論出發，團體間有嚴密的組織秩序和路線區分，對他者的實踐方式缺乏開放的態度。簡而言之，南北地域的行動者成長於相應的地域文化和實踐，但在當下政治逼仄的環境下，依然欠缺彼此互為開放的溝通和學習。

二、行動與組織模式

本部分初步概括當下青年行動者的的勞工實踐模式。從現有實踐中可看出，當下青年行動者的組織模式呈現多元化，但欠缺對工人群體的足夠影響力。

1、疫情下工人困境的臨時介入

新冠疫情在春節期間的大規模爆發，隨後的防疫混亂和市場停滯造成巨大社會危機，激發了民間自發互助的行動力。處於隔離期間的各地青年勞工行動者也在此時，自發形成線上團體回應當下的工人需求。

針對疫情期間春節假期後返工問題，有行動者組成線上協調小組發起“延遲返工控制疫情”行動，組建起一個超過 500 人的微信社群，發起全網線上倡議動員，向國務院表達“延長休假推遲復工”的訴求。輿情升溫間接促使政府在次日迅速作出回應，宣布延長假期三天，減緩了新冠病毒在返工人群中的擴散。

此外，由高中生、大學生以及社會白領多元組成的十多個自組織志願團隊掀起了一波關注環衛工防護健康的行動。城市環衛工作為防疫第一線的勞動者，在疫情期間嚴重缺乏防護用品。這群青年行動者，以“口罩+城市”作為代稱，如蝴蝶效應般在北京、深圳、上海、廣州、福州、珠海、成都、西安等十幾個城市迅速散播，有團隊甚至多達百人志願者。ta們通過“調研+募捐”的方式，呈現疫情下工人的低福利、低保障困境，募款捐助口罩等防護用品填補破漏的勞保體系。ta的行動一方面揭露了疫情下國家對一線工人弱勢群體的忽視，另一方面也啟發了公眾對工人社群的關注——隨後出現了很多市民和樂施會等 NGO 自發為環衛工送口罩。

亦有青年行動者團體關注受疫情影響的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疫情迫使學校課程轉為線上，但對於農民工子女，電子設備和通訊網絡的缺乏成了政策盲區。網絡上先後出現一些大學生自組織，如“8 方公益免費課業輔導”為貧困的打工子弟提供學習輔導，“光援計劃”、“七八點計劃”等為農民工子女募捐電子設備和撰寫調研報告反映網課背後的教育不平等問題。

2、泛左翼青年社團的常態自組織

北方青年勞工行動者的網絡主要依賴在校泛左翼社團的常態自組織。但遺憾的是，自 2018 年佳士事件後，左翼社團遭遇來自學校的大清洗，被改組架空、或取締註銷。很多耕耘多年的社團無法開展工作，如北大馬會因積極參與佳士運動而被強迫改組，北京語言大學關注社會工友的社團“新新青年”遭學校註銷等。

然而即便如此，仍然有極少數左翼青年團體堅持在學生社群中開展自我學習和勞工實踐。左翼青年社團現今開展的活動以理論學習為主，以讀書會、觀影會、講座等為載體；部分會開展常規的校工服務，如工人課堂、校工探訪等。此外，部分社團也會與其他議題群體進行跨議題合作，如性少數和性別議題，共同在校內倡導。左翼青年社團當下的行動趨勢總體上偏向溫和，並趨於減少對社會議題的直接參與。

3、參與勞工 NGO 實踐

多年來，一部分青年行動者會選擇以志願者、實習生或全職等方式加入到勞工 NGO 中，在積累一定的工作經驗後也會成為核心的工作者或者項目負責人。但由於自 2015 年以來政府針對勞工 NGO 團體的政治打壓，包括限制勞工組織的籌款管道和對勞工工作的刑事犯罪指控，迫使部分勞工組織關門或改變工作方向，從直接的工人權益支持往社群康樂類活動和流動人口服務調整。危險性增加和行動空間的縮窄，間接減少了青年行動者參與勞工 NGO 的機會，進而限縮了行動者在勞工議題的持續介入。

4、以新媒體為基礎的新嘗試

因線下行動介入空間的縮窄，勞工團體和自發的青年行動者在互聯網上開始嘗試建立以工人議題為導向的新媒體平台，包括微信公眾號、抖音、播客等。這些新媒體平台嘗試通過對工人權益相關議題事件進行報導或對特定工人權益進行解讀和科普，以此提高公眾對勞工議題的關注度和增強工人的權利意識。

當然，這樣的嘗試影響力仍然有限。一方面，在新媒體的實踐中，青年行動者難以與一線工人建立直接的社群連結，傳播上多止於對事件的報導和社會新聞的理論分析，無法涵蓋針對工人社群的組織工作。另一方面，在現階段的新媒體嘗試中，很難深入接觸到一線工人群體，與他們建立共同語言，也無法有效激發工人行動。因此，這樣的嘗試仍然在最初始的階段。

5、針對白領群體的文化組織實踐

在近一兩年，隨著華為、阿裡巴巴、京東等市場頭部企業不斷曝出壓榨員工的醜聞，白領行業的血汗剝削現狀不斷引發討論，“社畜”一詞成為白領勞工建立反抗資本主義剝削的文化認同關鍵詞。在線上和線下，有青年行動者們開始積極倡導和實踐白領群體間的合作社建設，亦組織關於“社畜”、“打工人”等議題的文化討論，並長期組織針對黑心企業的社群討論等。雖然目前影響有限，但可見白領勞工正在通過這些公共討論開啟對職場剝削的意識覺醒。如今，“出身 985-工作 996-離職 251-維權 404”式的工作場所壓迫，正在不斷增強白領勞工對自身作為受壓迫者處境的認知，在未來或許會引發更多類似於“996. icu”式的行動實踐。

三、政治管控與壓制

行動空間與風險共存，是近 5 年來的勞工團體和青年的共同遭遇，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公民社會對工人議題介入的活躍性，多年來政治管控一直在加強。

1、疫情下對青年行動者的管控

即便疫情下湧發的民間互助多數是溫和、去政治化、強調社會福利的，但仍然避免不了來自政府維穩部門的關注和干預。前述提及的關注環衛工的口罩團隊，在行動中籌款遇到很大的制度限制和政治管控。2016 年全國人大通過《慈善法》限制不具有公開募捐資格的組織或者個人公開募捐，社會籌款必須與具有公募資格的慈善組織合作才被視為合法。青年行動者自組織必須花費很大力氣尋找掛靠機構，甚至承擔自發募捐的法律風險，有團隊因此受到來自公安部門的多次騷擾問話，要求告知捐款來源和喝令停止項目。

此外，有口罩團隊因為發佈了環衛工人防疫調研報告和工人狀況視頻，而遭遇安全部門的問話，也有主流媒體轉載報告後被網宣部門要求下架。在北京，疫情志願者陳玫、蔡偉因在 GitHub 開放平台搭建網站“端點星”，備份疫情期間遭微信、微博等平台刪除的相關疫情報導和文章，而遭遇當局以“涉嫌尋釁滋事罪”為由被指定居所監視居住並隨後起訴。可見對於自發的青年行動，政府視其為嚴重的不穩定因素，甚至借用“口袋罪”將其定義為非法行為。這些政治上的壓制都迫使自組織行動無法在支持工人權益上走得更遠。

2、後佳士時代的常態壓制

2018 年佳士事件是針對中國左翼青年的一次歷史性的打壓，也是對青年行動網絡的重大破壞。針對佳士中勞工行動者的打壓，包括社團解散註銷、強制休學退學、短期拘押、教育轉化、強制擇業、指定居所監視居住、起訴判刑關押等，程度不一。部分佳士相關行動者在經歷了一系列的高壓管控後，在 2020 年恢復了極小的自由，如緩刑或強制就業和居住安排。但是這些行動者仍然難以重新投入對工人團體的支持工作當中；生活工作仍處於密切監控之中，亦難以在就業或教育上擁有自主權；其原先附屬的社團或 NGO 組織亦遭遇實質上解散，處於死寂狀態。這類針對佳士相關行動者的常態高壓管控，在可見的未來或將持續下去。

3、針對勞工 NGO 的雙重管控

針對勞工 NGO 的政治管控方式，政府已經從常態化的政治騷擾徹底向有罪化論定轉化，兼以募款上的財政限制。2015 年以前，各地政府針對勞工組織的管理採取定期的問詢和“拜訪”，偶爾也會施壓辦公地房東以此逼遷勞工機構，從而達到限制勞工機構影響力的目的。2015 年“123 勞工案”是政府首次對民間勞工組織進行規模化的抓捕和判刑，開啟了勞工工作有罪化的管控策略。

在此之後，中國勞工領域經歷了 2017 年廣工讀書會事件抓捕、2018 年佳士事件群體打壓、2019 年初深圳 NGO 五人打壓（吳貴軍、張治儒、簡輝、何遠端、宋佳慧）、2019 年微工匯（iLabour）三人抓捕、2019 年社工四人被抓（童菲菲、李長江、梁自存、李大君）以及 2019 年底的心環衛三人被捕。

到了 2020 年，所剩的勞工團體已不多，仍然存在的機構多數被迫轉型。在 2016 年頒布的《慈善法》和《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的雙重約束下，再加上勞工團體本身公眾籌款能力偏低，大多數勞工團體陷入經濟危機，在關閉邊緣，無法及時獲得境內外基金會資助；另一方面，今年亦有地方政府限制本土基金會資助勞工機構，也存在截留公眾籌款的情況，致使遺存的勞工團體陷入更深的生存窘境。

四、行動者的困境和出路

綜上所述，儘管在困境重重的當下，民間的青年勞工行動者仍然在不懈探索新的方式介入工人議題和社會危機，但不得不承認，勞工工作的空間和影響力都在不斷縮窄減弱。為了回應當前的運動困境和尋找新出路，行動者需要對既往行動模式的局限有所反思和批判。

青年行動者自組織在疫情期間的迅速聚合，有效地支持到一線環衛工人的防疫危機，並引起公眾和政府對於工人疫情保障的關注。但該短期行動本身並無法本質上回應工人最為核心的權益訴求，同時行動者亦未能（無計劃或有難度）與一線工人建立長久連結——行動未能轉化為對工人的賦權。同樣的問題存在於左翼青年社團中，行動者缺乏可見、安全的實踐機會，以助於形成對工人階級狀況的真實感知，難以建立與一線工人群體持久有效的連結。

勞工 NGO 多年來的組織模式同樣存在詬病。勞工組織模式傳統上分為：社區服務型、法律援助型和運動（集體談判）型。在遭遇政治打壓之後，中國勞工 NGO 聚焦點已縮小到工人社區生活和文化服務、勞動法律諮詢和心理支持等，謹慎地將自己角色單純定位為服務提供者。三類模式存在的共同問題是：長期著眼於臨時的勞資危機介入，對於工人工作場所的日常權力壓迫缺乏足夠認知和行動干預，故而減弱了對工人群體長期的賦能培育。

基於此，本報告嘗試提出勞工青年行動者未來值得嘗試和探索的兩個關鍵方向：建立對工人群體的直接實踐性認知，與探索賦權性的行業性工人日常組織實踐。

1) 建立對工人群體的直接實踐性認知：理解和認識工人群體是一切行動的起點。當下中國工人群體形態和面貌正處在急劇變化的階段，製造業向服務業轉型、新業態產業迅猛發展，都在重塑工人階級生存形態和權利意識。唯有對工人在工作場所中多樣化的產業變遷、日常壓迫和剝削形成充分的實踐性認知，才能夠尋求一條適合工人自主賦權的有效組織路徑。未來需要更多的有行動導向的實地調研與直接互動。

2) 探索賦權性的行業性工人日常組織實踐：讓工人成長在日常抗爭。當下的政治環境已極大限制了工人進行大規模的集體行動，行動者若繼續追求集體抗爭亦是不智的行動路徑，更未能有效的提高工人的階級意識。工人權利意識的萌發和培育來自於對工作場所權力壓迫的日常抗爭實踐。青年行動者極需在未來的實踐中探索工作場所中日常反抗的新實踐（如針對特定行業的工人培育），或採取新的組織方式介入到工人教育中（如新媒體等）。

最後，南北的青年勞工行動者仍然缺乏開放的互動、學習與合作，這既影響到推動工人進步議題上的團結和協作，亦極大限制了探索新行動路徑的想像力。這要求南北勞工行動者逐步去形成互為支持的新網絡。

在大規模的相繼打壓之後，勞工組織和青年行動者行動受限愈增，工人組織實踐處於想像力的危機。青年行動者更加需要能夠沉住氣，重新投入到認識工人力量的探索中，並開啟新的日常嘗試。工人組織工作也會是低調、長久的，但培育積累的工人意識絕不會消失；青年人應跳出書齋、擁抱工人實踐。

第三部分 青年女權行動者²

- 一、行動者群體面貌
- 二、行動與組織模式
- 三、政治管控與壓制
- 四、行動者的困境和出路

² 出於安全考慮，第三部分的內容暫時不在公開平台傳播。如欲索取和閱讀此部分，歡迎致信 youngactivists2020@gmail.com 來信時，也歡迎告知你的身份，這樣我們就可以認識你了，謝謝！

第四部分 青年身心受障行動者

撰寫者：匿名

一、行動者群體面貌

這部分涉及的身心障礙青年行動者，包括已註冊的公民社會組織、身心障礙者代表組織、社會企業中工作的身心受障人士，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身心受障學生，和社交網絡中積極參與身心障礙平權議題的受障者。

2014 年，中年盲人李金生首次獲得盲文試卷以參加高考。儘管因盲文閱讀不力，他個人考試失利，但在民間組織的推動和教育部的積極反饋下，身心障礙者融合的考試方式在全國範圍逐步推廣。高考和自學考試等開始逐步為身心障礙考生提供電子試卷、大字試卷，准許延長時間、可攜帶光學輔助設備、配戴助聽設備等。這些政策為更多的身心受障考生提供了進入高等教育的機會。

在這樣的背景下，一些從隔離式、或欠缺共融支持的教育系統中破局而出的受障者，日益成為了當前青年行動者的重要力量。相比更廣泛的社群而言，他們有較高的文化水平，參與公民社會組織的培訓後，有更多機會通過網絡向社群傳播，並積極與青年學者建立聯繫；作為主流社會觀念中的奮鬥楷模，一些行動者受到校方的認可，也常有教育受挫的學生前來求助。一些青年受障者會向求助者提供與校方溝通的資訊，或通過自己的人脈網絡（包括媒體、公民社會組織、上一代倡導者等）為求助者尋找支持。

二、行動與組織模式

身心受障行動者針對什麼議題、以什麼的形式採取行動，與當前中國身心障礙權利狀況和公民社會活動空間等背景密切相關。

首先，近年來中國政府對公民社會嚴格管控，給身心障礙者代表組織的資金來源和活動空間劃定了界限，身心障礙領域的權利導向機構幾近解散，身心障礙者代表組織在官方審查和自我審查的雙重壓力下，多採取“重服務而輕權利”的發展策略，雖然一些規模較大的機構有機會通過與地方政府的協商提供個案支持和參與政策制定，但這一路徑對於小型組織和個人而言門檻甚高。

其次，身心受障者的權利在中國不屬於政治上敏感的議題。由於結構性的不平等，身心障礙群體無疑是弱勢族群中更脆弱的一支，官方對此討論的容忍，可以體現出官方對弱者的同情和對民生問題的關注；中央和地方的各級殘聯，通過對個人發放福利和購買社會組織服務，實際上對基層的身心障礙群體和代表組織的行動進行管控。此外，中國政府一貫以發展的話語“重塑”人權議題，在身心障礙權利議題表現尤為明顯，比如以“扶貧減貧”回應身心障礙群體所面臨的結構性不公，這些官方話語也削減了主流社會從權利視角對於身心障礙話題的討論。

儘管 2010-2014 年間，中國內地曾有活躍的身心障礙權利倡導行動，但隨著相關機構被迫解散，行動者間缺乏有效的代際傳承，加之當前核心機構的行動方式限制了新一代青年身心受障群體對權利行動的想像，青年身心受障行動者極少採取反抗行動，而更多地是提供朋輩支持。具體而言，這些網絡多由幾位經歷和志趣相投的身心受障青年創立，以自媒體平台為陣地，以經驗傳承、權利意識提升、網絡發聲聲援為主要行動方式，來影響更廣泛的身心受障社群，這是本文所討論的青年身心受障行動者的主要特色。另外，在新冠疫情爆發初期，這些青年行動者也會提供直接的服務，以回應社群在危機下的緊急需求。

本部分將圍繞 2020 年身心障礙青年行動中最主要的兩個議題進行觀察和討論，即身心障礙青年如何回應疫情及其影響（“抗疫”），對高等教育階段受教育權的持續呼籲（“求學”），並討論行動者從多重身份視角參與身心受障與性別議題的零星行動。

1、“抗疫”行動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漢爆發。1 月 23 日凌晨，武漢全面封城，隨後湖北省黃岡市、孝感市等十餘城市相繼封城。因為缺乏資訊無障礙支持和有效的社區照護，身心受障者自疫情爆發初期開始，就處在最脆弱的處境，青年受障行動者作為最了解障礙的專家，從自身經歷出發，以多種形式參與“抗疫”行動。

有受障經歷的青年行動者注意到封城給疫區身心受障人士的日常生活帶來的不便，開始在自媒體平台上討論疫區受障者的經歷。在武漢和其他地區的行動者反應迅速，為聽力、視力受障者獲取提供防疫資訊的手語和文本轉譯。1 月 29 日，在湖北省黃岡市轄屬某村，腦癱少年鄢成的家人疑似新冠肺炎而被強制隔離，生活無法自理的鄢成因無人照料，餓死在家中，該事件經媒體報導後引發身心障礙者代表組織和青年受障行動者的強烈關注，有行動經驗的權利倡導者號召成立義工網絡，應者雲集，“抗疫義工網絡”迅速成立、開啟工作。

“抗疫殘障義工網絡”彙集了來自慈善組織、社區服務組織、身心障礙者代表組織的工作人員，也包括了草根志願者和青年受障行動者等不同類型的公民社會力量，在短時間內開展受障群體疫情下的需求調查，自發組成了聚焦不同需求的支持小組，提供防疫物資支持、心理支持、居家鍛煉指導、生活物品代購、線上診療卡發放服務等。“抗疫義工網絡”的行動者更像是自發集結的救災志願者，行動目的在於緊急時期針對疫區受障群體的特殊需求迅速作出回應。此外，青年受障者網絡社區也梳理和匯總了與疫情相關的新聞中涉及身心受障者的報導，以及身心障礙者代表組織的防疫行動，以網絡發聲的形式，擴大身心受障群體在緊急狀況下的可見度。

因為缺乏信息無障礙，視力、聽力受障者、聾人和心智受障群體一直是信息弱勢群體，疫情爆發後，青年受障群體和她們所在的社群小組，踐行資訊平權，即時轉譯防疫資訊，製作防疫指南，以手語視頻、圖文轉譯、簡易圖文版等方式，向不同需求的受障者提供資訊，彌補公共衛生部門工作的不足。

由青年受障者組成的小組，在自媒體平台質疑政府發佈防疫資訊時不提供手語和字幕，並梳理了國際標準和國外的經驗。曾為聽力受障者爭取平等參與教師資格考試的青年受障者杜銀玲，在大年三十晚上錄製了第一條介紹防疫知識的手語視頻。她同時是“抗疫義工網絡”的成員，和社群

小組成員一起錄製了一系列手語視頻，視頻在微博、微信等平台廣泛傳播，被多家抗疫志願組織轉發，流覽量最高達到 3700 多萬。社會企業“你看起來好動聽”在疫情期間錄製了 34 條手語視頻，改善了聽力受障者和聾人社群資訊不通達的問題。

在疫情爆發初期，在武漢的一家聾人公益小組即發現，許多聽力受障者和聾人不懂信息識別，更容易誤信謠言，或低估疫情的嚴重性，或因獲取資訊太遲而買不到必要的防疫物資。小組中的青年受障者一對一地以手語方式詢問聾人社區的需求，並為聾人社群爭取物資捐助、派發物資等。一家青年受障者網絡社區舉辦了關於資訊無障礙的網絡討論，邀請聾人組織和信息無障礙研究者為社群進行資訊平權的科普，提升其權利意識。

此外，一位“抗疫殘障義工網絡”成員插畫師以漫畫的形式製作簡易圖文版的防疫手冊，幫助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兒童解釋新冠病毒的傳播管道、戴口罩和洗手的正確方式等。由幾位盲人大學學生組成的小組發現新媒體傳播的防疫資訊多以可視化圖表的方式呈現，為視力受障者提供了文本轉譯。

除此之外，一家青年受障者網絡社區進了解放研究³，從受障者經歷和需求出發，反思防疫抗疫政策，並提出應對未來類似緊急情況的服務和支持建議。研究也關注並納入了同樣生活不便、有長期用藥需求、信息弱勢的老年群體。這與該社區以往的活動形式不同，以往多採用社群故事徵集、經歷分享、邀請專業人士普及障礙權利知識等方式提供朋輩支持，這是首次開展更專業的研究和執行小型科研項目。

2、“求學”行動

目前可見的權利倡導集中在考試權倡導，這讓倡導者與一些經歷過高考的青年行動者有著天然的聯繫。青年行動者或受益於前輩倡導得來的高考合理便利，或在解決自身考試問題時向前輩行動者求助，或在繼續升學深造的過程中仍須面對高等教育環境中的不公，或作為有經驗的前輩常收到學弟學妹的求助。因此，當她們作為當前身心受障青年行動者的重要力量時，仍熱心保持著對教育平權問題的關注。

2020 年，一家青年受障者網絡社區的核心成員申請了自學考試的合理便利，與主考部門溝通時徵求了上一代行動者的建議，並公開分享了申請和考試的經歷以為後來者提供範本。高考季，再有盲人考生創造“高考神話”，獲得主流媒體的關注，上一代行動者的積極推進深入討論，幾位首屆參與高考的受障者積極接受媒體採訪，藉由輿論呼籲高考平權，包括高等融合教育進入和錄取的平權。11 月研究生入學考試前，盲人前期與高校溝通中被告知無法提供教育支持、不建議報名該校，該事件由某主流身心障礙者代表組織介入支持，獲得媒體關注，參與普通高考、在讀研究生的一位受障者在自媒體發文聲援，譴責高校“開倒車”。

³ 解放研究，即將障礙人士變成知識的生產者，並以他們的切身經驗做為投資與改善社會機制的基礎。基於這樣的理念，從事障礙研究時，障礙人士從研究議題、研究問題、研究方法、資料收集與分析、報告解析與呈現，都必須擁有其主導權。（來源：吳啟誠、張俊日《解放研究：障礙研究主導權之轉移》）

身心受障大學生的校園融合近年來也受到主流受障者組織“聲波”和青年受障者網絡社區的關注，參與普通高考，並在大學學習中受到“金盲杖”支持的青年受障者作為準大學生自立生活的培訓師，為視力受障的學弟學妹提供支持。同時，青年受障者網絡社區也在為受障學生支持，2020年是第三年開展這類支持活動，受助學生包括不同障礙類別的學生，為其提供大學“過來人”的學習和生活經驗，也提供與校方溝通合理便利需求時的策略和建議。“抗疫殘障義工網絡”贊助者之一也與此社區開展合作，申請到國內基金會的小額項目開展校園無障礙的工作。

3、探索交叉議題

2020年，青年受障者也在探索與身心障礙類似或交叉的議題，包括研究疫情下的老年人權利、以動畫短片形式討論受障女性的性權利，和討論受障性少數的多重身份問題等。如前所述，青年行動者在初次嘗試的科研項目中，對老年人在防疫抗疫中的需求也開展了研究，提出了建議。有攝製經驗的青年受障者參與女性主義網絡共學小組後，和青年女權行動者共同製作了一則動畫短片，討論使用輪椅的女性的性需求。青年受障者網絡的社群和志願者中有一些性少數人士，在“國際不再恐同日”時針對身心障礙和性少數交叉議題在自媒體發文章，梳理其相似性、交叉性，呼籲更多人關注這些群體的處境。

三、政治管控與壓制

2008年聯合國公佈《殘疾人權利公約》，中國政府於當年率先加入公約，中國的殘障權利議題受到國際社會關注，從事相關工作的公益組織有機會獲得更多資源。2009-2014年間，中國內地曾有活躍的身心障礙權利倡導行動，以社群動員、街頭行動、政策倡導等策略，就無障礙、就業、教育等議題開展倡導，並收穫身心障礙社群和主流媒體的關注。

2014年後，雖然政府仍在“扶貧融合發展”的話語下討論殘障議題，但官方對民間倡導機構的態度變為強硬。身心障礙權利領域有影響力的倡導組織，幾乎不再存在。其他關注身心障礙議題的組織，也逐步轉向開展社會服務、開辦社會企業和在社群內部推動身份認同，逐步被主流社會所認可，規避了政治風險。

目前，身心受障的青年行動者極少開展較大規模的反抗行動，而多採取朋輩支持的溫和方式在線上進行活動和文化探討，因而很少受到來自官方的壓力。一些受障者行動還以學生社團活動的名義獲得了所在高校的支持。過去曾有受障行動者因參與過境外非政府組織的活動而受到地方政府的騷擾，而非因為參與障礙議題，並且官方也未限制其繼續參與障礙議題。

四、行動者的困境和出路

身心受障的行動者面臨的最主要挑戰是缺乏權利導向的行動環境。

障礙平權領域，既沒有#metoo 運動這樣廣泛的意識啟蒙和去中心化的抗爭行動，沒有在運動中脫穎而出的意志堅定的社群領袖，也沒有類似 LGBT 運動中作為中堅力量的權利倡導型組織來引領運動的方向，提供良好實踐作為行動範本。

如前所述，身心受障的行動者在這樣一個萬馬齊喑的環境中，接觸和參與的大多是社群支持類行動，對權利運動策略和目標缺乏想像力，他們所看到的制度改革，更多的是由政府主導，或由主流的身心障礙者代表組織與地方政府協商而促成。儘管有行動者以公開聲援的形式支持受障者個案救濟、提出制度建議，但力量有限，難以發出更大的聲音，也難以對群體權利訴求的制度化轉換產生更大的影響。幸而就朋輩支持行動而言，當前的青年行動者尚可以有效利用現有的資源和網絡，進行國內外資訊和經驗的轉達，和平等權利意識的普及，卻似乎也局限於此。

或許，從長遠來看，零散的行動者在有限的空間內逐步探索，對障礙平權運動而言未必是一件壞事。相反，若外部力量向風險抵禦能力更低的青年行動者提供支持時，沒有充分考慮行動者在強權下的脆弱性，或許會對青年受障行動者個人和社群造成負面影響，甚至挫傷他們參與行動的積極性。未來時間裡，希望可以有更多機會，向國內的行動者提供域外同儕的實踐經驗，給其行動增加啟發和想像。

第五部分 青年同志行動者

撰寫者：匿名

近十多年，中國大陸的同志運動（“LGBT”即男女同性戀、雙性戀和跨性別，中文語境下常用“同志”統稱）從幾乎不可見的狀態，發展成為年輕、極具活力的社會運動。特別是進入社交媒體時代後，廣泛的青年同志參與更是為運動打開了新的局面。但隨著政治環境緊縮，資金管控加強，一大批同志組織被迫關停，僅存的組織走上轉型之路。在有限的空間裡，青年同志行動者們開展草根社區建設並提供服務，通過倡導行動提高社會接受度。本報告將主要以加入同志組織的青年行動者、校園同志小組行動者和跨性別青年行動者三類對象展開，嘗試描述該群體的基本面貌，探索作為行動者的成長路徑，接著呈現 ta 們的行動和組織方式，特別是新冠疫情下 ta 們的行動，最後討論 ta 們的困境和出路。

一、行動者群體面貌

出生於 1992 到 2003 年，這些青年同志行動者多數來自於城市中產家庭，也有成長於農村，大多數是家裡的獨生子女。ta 們中有參與校園同志小組的高中生和大學生；也有參與到民間同志組織的工作人員和志願者。帶著“少數”的性別身份和生命經歷，ta 們加入到同志運動，也藉此打開公民社會的大門關注更多社會問題，不少人同時投身到女權、愛滋、勞工、殘障等領域。

對性與性別的認知、探索和反思，是 ta 們人生的重要主題之一，每個人都有獨特而珍貴的經歷。ta 們從小被默認為順性別異性戀者，不得不在內心的掙扎中，掩飾和隱藏自己不合常規的那一面。基於性傾向、性別表達和認同的家庭暴力、校園欺凌幾乎在大部分行動者身上發生，這些創傷和自我壓抑的經歷驅使他們尋求資源去認識世界和自己。大部分青年同志行動者在大學之前，依靠互聯網提供的信息幫助下接受自我，實現自我認同；少數則是在國外留學期間完成自我認同。女權主義和酷兒理論的視角讓 ta 們理解順性別異性戀霸權的權力結構，對平等和多元的追求也更加深刻。

青年同志行動者的參與平台主要是同志組織和校園同志小組，包括在校大學生和畢業不久的年輕人。ta 們主要通過社交媒體、參與同志社群活動等方式了解同志組織，被同志組織推動的議題和工作內容吸引，以全職或兼職員工、實習生和志願者的身份加入同志組織。早期的校園同志小組多為大學教師開設的性別研究課程的助教團隊發展而來，教師的意見和支持對小組發展起到重要作用，因此早期的同志小組主要分佈在精英院校。校園同志小組的發展與同志組織息息相關，青年行動者參與同志組織舉辦的青年培訓後，回到校園成立同志小組，從而推動校園同志行動在各地傳播。

二、行動與組織模式

1、同志組織

在公民社會行動空間收縮，境外資金加強管控的背景下，一大批同志組織被迫關停，許多組織開始轉型，走上與體制、與主流公益基金會合作成立專項基金的道路，並且日益專業化。融入主流公益的嘗試裡有成功的案列，也有失敗的案例。在有限的空間內，同志組織採用多部門合作的策略，聯合公民社會、法律、教育、學界、衛生、心理、媒體、商業、藝術和政府部門的人士，在愛滋干預、心理健康、家庭接納、同性婚姻、性別教育、就業平等、校園霸凌、家庭暴力、跨性別醫療、去病理化、扭轉治療、職場多元等議題開展服務和倡導活動，取得了不小的成果。即使管控和歧視普遍存在，上述成果本身也岌岌可危，但在當局對公民社會敵意加劇之際，自下而上的同志運動依然活躍，對於社會的意義就顯得尤為可貴。

2、校園同志小組

校園同志小組發展從 2005 年興起，並在近五年數量上升。在分佈上，基於大學的同志小組主要分佈在教育資源集中的長三角、珠三角、京津、武漢、西安等地。在規模上，小組的核心團隊在 1 人到 35 人，志願者團隊在 4 人到 60 人。ta 們以提高校園同志能見度、建設同志友好型校園環境為目標，日常工作包括校園同志社群建設、愛滋預防和檢測、性別研究、LGBT 科普教育等，ta 們也會利用國際不再恐同恐跨日（5 月 17 日）、紫色校園日（十月第三個星期四）等節日在校內發放彩虹旗、手環、科普傳單，舉辦講座、研討會等意識提升活動。在社交媒體上，小組利用微信公眾號、QQ、豆瓣等平台傳播 ta 們的工作，在社群內建設小組提升影響力。經過多年的努力，某小組的微信公眾號已經成為該校最受關注的微信公眾號之一。此外，青年同志行動者也與青年女權行動者高度重合，許多校園同志小組也是校園內女權議題的推動者，參與了#metoo 反性騷擾倡導和建立衛生巾互助盒等議題。

隨著同志可見度的提高，也出現了基於國際高中的同志小組和青年行動者。ta 們家境優越、資訊發達，國際高中的環境給了 ta 們更高的視野，讓 ta 們更敢於認同自我。ta 們以科普多元性別為起點，除了發科普傳單、舉辦觀影活動外，ta 們還舉辦變裝、Vogue 舞會等更具同志文化的活動。

3、跨性別組織

在國際跨性別運動快速發展的背景下，近五年在中國湧現了不少關注跨性別議題的青年跨性別組織，主要分佈在北京、上海和廣州。這些組織核心的青年跨性別行動者大多有曾在同志組織工作或實習的經歷，也都參與過同志組織舉辦的能力提升培訓和青年行動者培訓活動。跨性別青年運動的興起讓人們看到更性別非二元、更酷兒、更突破生物本質主義的群體。

跨性別社群的快速發展與社交媒體的出現密不可分。在過往，除了公園、街頭等跨性別性工作者聚集的空間外，跨性別者只能在為跨性別者提供醫療服務的醫院或醫院周邊的速食店裡拓展線下聚集的空間。社交媒體提供的線上空間成為了跨性別社群聚集和跨性別信息流通的平台。依託微信公眾號和 QQ，跨性別青年行動者們和同志組織合作開通了第一個全國跨性別熱線，並且通過熱線連結到更多跨性別社群。

跨性別者面臨更高的家暴、校園霸凌、輟學、失業、被強制扭轉治療的概率，同時面臨更嚴重的心理狀況：67.6%的受訪者曾經強烈厭惡自己的生理性別，72.8%對青春期發育有過強烈痛苦與焦慮。而這些跨性別青年組織致力於為跨性別社群提供社群陪伴和同輩支持、跨性別醫療信息，跨性別經濟賦權、免費的心理諮詢以及跨性別社群媒體與文化平台。相較於同志運動而言，跨性別運動還處於社會更邊緣的位置，權利訴求可見度仍比較低。

4、疫情下的行動

新冠疫情給同志社群、同志組織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封鎖和隔離政策導致的工作計劃延後或取消，加重了組織和行動者的經濟困境。此外，隔離政策造成了愛滋感染者無法獲取藥物，面臨斷藥和耐藥的風險。由於早期愛滋感染者和活動家的推動，中國政府推出了“四免一關懷”政策，其中包括幾種免費藥物供應。耐藥即由於斷藥造成的原服用的國家免費藥物失效，此時需要服用昂貴的自費藥物才能控制病毒狀況。為了解決藥物問題，同志組織一方面組織感染者社群互相借藥，另一方面 ta 們和疾控部門合作，幫助指導感染者異地取藥、郵寄藥物。而在新冠疫情的始發地武漢，封城封村政策甚至讓人寸步難行，感染者無法獲取藥物，向警察、街道、居委會求助也沒有得到幫助。

危機下武漢同志中心及時恢復工作，並且組織愛心車隊和 100 人志願者，冒著巨大的風險和壓力為感染者送藥。志願者的車隊被擋在長江大橋的警察攔下時，武漢同志中心當機立斷，在社交媒體發聲求助，他們寫下的“緊急求援，這些人的生死不該被遺忘”得到了大量轉發，並引起武漢疫情防控指揮部的關注，最終他們拿到了通行證。武漢同志中心的行動讓決策者瞭解交叉議題弱勢群體的困境。

疫情期間的居家生活使得許多同志人群陷入心理危機。由於無法外出，長期與家人的生活，同志人群面臨被家人發現其同志身份的風險，也更容易與家人產生衝突，引發家暴。疫情帶來了國際性的健康問題以及嚴重的群體心理壓力的同時，也使跨性別者面臨更加難以獲得激素干預和性別確認手術的困境，以及隨之而來的心理健康方面的負擔。為此，同志組織開展了各類線上心理健康講座、線上分享、心理危機熱線等服務。

同志組織還處理了疫情下的同志社群緊急狀況。2020 年 4 月，隔離期間跨性別女生“烤魚”被其母親發現跨性別身份，遭到嚴重的家暴，並且被綁架到一家醫院，強制進行其所謂的扭轉治療，通過中藥注射劑、電擊、精神羞辱等方式，試圖改變“烤魚”的性別認同。多家機構分工合作，遠程協助報警，當地志願者趕往涉事醫院接出“烤魚”，持續提供法律援助、連續陪伴、自殺干預、家長科普教育等支持。最終在志願者們和輿論的影響下，該醫院決定不再收治“烤魚”。

另外，整個春季學期，幾乎所有學生都在居家上網課。對於多數同志青年校園行動者而言，支撐 ta 們的很可能是同志小組內部成員建立的連結，以及改變不友善環境的渴望。失去線下見面和做活動的機會，對於校園同志小組也是一個非常沉重的打擊。幾乎所有小組在隔離期間都停止運作，不僅無法加強成員間的連結，也失去了提高小組新人能力的機會。一位小組核心成員表示：“整個學期停止活動削弱了小組的凝聚力，新進小組的夥伴對小組認同感不強，積極性不高，這

導致我們夏季學期開學招新沒有招到一個人。我非常擔心小組之後的交接問題。”僅有幾個小組嘗試在網課期間開展線上活動，由於缺乏組織線上活動的經驗，活動參與度很不理想。

三、政治管控與壓制

1、行動者和活動開展

同志組織和行動者最常受到的壓力是安全部門的談話，對行動者及其家人的騷擾，以及干擾活動場地導致活動取消或延遲。2020 年至少有三名核心志願者被警察談話，警察對 ta 們住所的隨機檢查讓 ta 們感到不再安全。除了受國安和國保的監控和騷擾外，如工商、民政、街道社區、文化稽查等部門都參與到管制之中。每年六月被稱為“驕傲月”，“上海驕傲節”會在六月集中舉辦豐富的活動如彩虹跑、派對、影展，也有多元招聘會和同志小組開放日等服務於社群和同志組織的活動。全部由志願者構成的“上海驕傲節”團隊還會籌款支持同志組織。2019 年上海文化部門以“上海驕傲節”舉辦的影展不具資格，違規公映為由開出了 15 萬元的天價罰單。2020 年 8 月已經連續舉辦 12 年的“上海驕傲節”正式宣布終止所有活動。

2、組織註冊的困擾

在組織形式上，無法以“同志”身份進行註冊的尷尬仍然存在，選擇商業註冊或不註冊的組織佔大多數。但在管控較為寬鬆的二三線城市，越來越多的同志組織成功嘗試以“青年組織”、“社工組織”等名義進行民辦非企業單位註冊。註冊讓同志組織獲得合法身份的同時，政府對組織的管制更加行政化。一位完成註冊的組織負責人坦言，行政成本與黨建工作對於資源和人力薄弱的同志組織而言是不小的負擔，不僅需要減少為同志平權的倡導工作，有時還會被主管部門安排開展一些“更主流”的工作。

對於專注於提供服務的組織，註冊相對更容易。一些專注愛滋預防和教育的組織，以服務提供為導向，他們常利用與政府官員的關係進行倡導活動。一個正面的案例是，某二線城市的同志組織早在 2011 年便以社工機構的名義註冊，善於維護政府關係的 ta 們常組織同志社群與政府官員打羽毛球。合法身份幫助 ta 們打通更多政府部門的關係，撬動到更多社會資源。多年的合作讓 ta 們成功取得了體制的信任，得以成功向主管部門出櫃，公開其服務性少數人群的業務。合法身份以及主管部門的信任使得 ta 們多元性別的培訓能夠走進教育機構、社工機構、公安、疾控甚至政府部門，也幫助解決了長期以來辦公室被鄰居投訴的問題。ta 們還擅長將同志社群需求與主流議題如青少年服務、性別教育、愛滋病防治、藥物成癮預防干預等結合，利用體制資源開展大量的工作。不過，也有行動者擔憂被收編的同志組織將失去議事能力，淪為緩解社會矛盾的維穩機器。

3、針對校園同志小組的限制

50 個大學同志小組中，只有不到一半的小組能夠在學校註冊為社團，且均是以“性別研究”、“同伴教育”、“愛滋干預”等名義。其中有兩個小組在註冊後被強制註銷。沒有“合法”身份，小組無法在校內參與社團招新活動，無法在校內獲得活動場地。如今不少同志學者完成學業，在

國內大學任教，ta 們為本校的同志小組提供庇護，成為小組不掛名的指導老師和與校方之間的協調者，在學校內為小組開闢更多活動空間，為小組的工作給予學術支持，幫助小組在學校內獲得活動場地和資源。校醫院和校心理中心的工作人員有時也能為小組提供支持，賦予小組合法身份。然而當該工作人員離職時，小組又會迅速回到“非法組織”的狀態。

校園外的同志組織和青年同志網絡組織也是小組的重要支持來源。ta 們為小組和青年行動者提供資源和能力建設，更提供線下見面機會促進小組間的交流、學習和能力。一些青年同志行動者發現學校官方的態度幾乎不可能改變，而學校短期內也不會開放空間給同志小組，於是 ta 們將目光轉移到校外，發展成獨立的青年同志組織。

自 2018 年對左翼學生社團打壓以來，當局對大學學生的管制更加嚴苛，一位大學老師透露，如今對學生連結非常警惕，就連舉辦跨校的籃球賽都要經過嚴格的審批。學校輔導員、團委、學生工作處和安全部門對行動者，甚至通過行動者的家長來施壓。為了干預校園同志小組活動，校方甚至在民族主義層面來抹黑小組。2018 年某校為了阻止小組舉辦的不再恐同恐跨日倡導活動，通知全校學生不許參與活動，稱該小組是“被境外勢力利用的非法組織”。

除了上述三個層面以外，當局近年來還加強了民族主義、傳統文化的宣傳和社會控制來鞏固對權力的壟斷。從道德層面的、病理層面和意識形態上的對性，對同志社群的汙名和審查仍是同志組織和青年同志行動者需要面對的。

四、行動者的困境和出路

1、行動者的經濟困境

同志運動的有限空間和資源限制了青年同志行動者的個人成長。微薄的收入不能滿足行動者的生活需求，許多行動者迫於經濟壓力不得不離開運動一線。一些同志組織定期開展心理小組給行動者提供心理支持，幫助他們調整預期。

2、校園小組

校園同志小組面臨換屆困難的問題。幾乎每年都有許多活躍的社團由於核心成員的離開而終止運營。原因在於，缺乏“合法身份”造成招募新的學生會員的困難，以及忽略內部建設導致的小組缺乏行動經驗和歷史傳承。同時，校園兇險的環境對同志青年校園行動者的抗壓和風險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缺乏經驗的行動者很難在家庭和安全部門的壓力下堅持行動。需要支持同志青年校園行動者的外界幫助提升 ta 們風險管理意識和能力，以及針對校園同志行動者的運動創傷的療癒。同時，幫助 ta 們在校園內外找到願意支持 ta 們的教職工和同志組織亦非常重要。

3、跨性別群體的困境和出路

相比同性戀社群而言，跨性別社群有整體人數更少，承受的社會歧視更大，心理健康狀態更差，經濟壓力更大，廁所/更衣室/宿舍等公共設施不友善的特點。還有恐跨女權主義在輿論上對跨性別社群進行衝擊，社群內部對跨性別社群認同度低的困境。跨性別青年行動者也缺乏行動經驗和

倡導能力。跨性別青年組織和行動者需要可見度更高的公益行動來吸引社群參與社群活動，並且就相對緊急的心理健康、自殺預防和干預、就業平等的議題開展行動。跨性別青年行動者還需要聯合女權主義者建立多領域的合作。外界需要為跨性別青年行動者提供能力建設和資源支持，創造國際跨性別行動者的交流機會，以幫助行動者學習域外經驗。

4、機會與建議

儘管面臨如此多的困境，同運仍有可觀的發展空間和社會經濟資源等待青年同志行動者挖掘利用。青年同志行動者要改善同志人群的處境，有三個方向可以努力。第一，善於利用現行的社會制度保護同志社群的權益，為下一步的進展奠定基礎；第二，將同志社群的權利融入到主流議題，例如“性教育”和“防治校園欺凌”正式納入未成年人保護法，需要青年同志行動者對“性教育”和“校園欺凌”議題開展持續且深入的倡導工作；第三，開展多領域的交流合作，建立廣泛的聯盟。青年同志行動者需要學習其他社會運動的經驗，打開對社會運動的想像，同時行動者的聯結也是抵抗政府分化公民社會的方式。

-完-